

荔园国学丛书

主编 / 景海峰

唐宋文学论稿

刘尊明 — 著

 科学出版社

荔园国学丛书

主编 / 景海峰

唐宋文学论稿

刘尊明 —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共收录文章 26 篇,其中唐五代文学研究论文 12 篇,宋代文学研究论文 11 篇,书评 3 篇。唐五代文学研究既有唐诗咏三国、唐代诗人与驴、唐五代边塞词、五代荆南文学等专题探讨,也有对李白、韩愈、温庭筠、牛希济等人的个案研究,文体涉及诗、词、散文和小说。宋代文学研究以宋词为主体,既有定量分析,也有定性考证,不仅有分调词史的考察、音乐描写与文学幽默的解读,而且也涉及晏几道、苏轼、秦观、康与之、周紫芝、陆游等个体作家生平、个性、交游、创作的考证与探赜。

本书适合中国古代文学和唐宋文学的研究者和学生阅读,也适合一般文学爱好者、国学爱好者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宋文学论稿/刘尊明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7.6

(荔园国学丛书/景海峰主编)

ISBN 978-7-03-053399-9

I. ①唐… II. ①刘…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唐宋时期—文集 IV. ①I206.4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33427 号

责任编辑: 郭勇斌 蔡 芹 / 责任校对: 李 影
责任印制: 张 伟 / 封面设计: 黄华斌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教图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7 年 6 月第 一 版 开本: 720×1000 1/16

2017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8 1/2

字数: 368 000

定价: 8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丛 书 序

深圳大学的国学研究始于 1984 年，在新一轮的国学热潮兴起之前，已着先鞭。

那是在改革开放的春天，伴随着深圳经济特区的建设，1983 年 9 月即诞生了特区的第一所大学——深圳大学，并在建校的第二年便成立了国学研究所。当时，国学一词并不流行，国学之说尚有禁忌，为什么会用这个概念来命名一所人文学术研究机构？这就要从它的创办人汤一介先生说起了。汤先生时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也是中国哲学教研室的主任，他在八十年代初赴美访学时，接触到了海外中国文化研究的许多新信息和新理念，这在当时封闭的状况下是有很多新鲜感和强烈刺激的，也由此产生了许多新的想法。在他与夫人乐黛云教授一起回国之后，恰逢深圳大学正在筹办，于是应张伟校长的邀请，乐先生出任了中文系的主任，并创办了比较文学研究所，而哲学系暂不能成立，只好先办一个偏重中国哲学的研究机构，这便是国学研究所，由汤先生主持。国学一名，当时的人们并不熟悉，但具有家学渊源的汤先生却不陌生，民国时期的北大即有国学门，办有《国学集刊》，而矗立其间的“台柱子”便是他的父亲汤用彤先生。所以，当时用了国学之名，究诸原委，实有其缘，是不是有先见之明，就另当别说了。

国学研究所成立之后，恰是当时国内的文化大讨论如火如荼之时，在汤先生的带领下，国学所的同仁们投入其中，做了很多具有开创意义的工作。举其要者：一是创办了大型的国际性学术集刊《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先后出版 4 辑，发文百余篇，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过广泛影响；二是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协调会议，集中了一批中心城市的知名学者制定规划，对八十年代后期国内“文化热”的兴起起了重要的作用；三是与当时的国家教委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联合举办了两届国际“中国学”研讨班，为全国 30 余所高校培训了一百多名从事比较文化和汉学研究的青年教师；四是较早和海外的学术界建立了联系，特别是与香港的几所高校有了密切的交往；五是在古籍整理方面，参加了广东高校“岭南丛书”大型项目，并在古籍整理的电子化方面做了一些奠基性的工作。这些活动的开展，在当时都是借了改革开放的东风，在国内具有一定的拓荒意义，起到了引领风气的作用。国学所在深圳大学建校之初的八十年代，也为学校的文科建设、特别是传统学术研究的积累，为提升学校的学术声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到了九十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高校的人文

学术遭遇了寒流，传统学科一蹶不振，深圳大学的国学研究也一度沉寂了下来，几乎陷于停顿。正所谓斗转星移、时事难料，在学院内部的传统国学研究遇到顿挫、文史哲学科陷于生存困境之时，在市场经济活力的冲击和挟裹下，此时在社会上却悄然兴起了一股国学潮，传统文化在社会上有了复苏的迹象，国学理念也渐渐为社会大众所接受和熟知。这个翻转本身就很有戏剧性，而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的国学热，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和大国地位的显豁，则演绎出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剧情，锣鼓铿锵、人腾马跃、各色粉墨、正谐相随，一幅好不热闹的场景，实为近代以来所罕见。

经过了二十年的发展，国内的国学热，潮涨潮落，几度翻腾，浪花相逐，亦泡沫堆积，呈现出了远比最初的时候要复杂得多的面相，可以说是五光十色，令人眼花缭乱。到了今天，对国学的理解和国学之研究早已不是往昔的景象了，也已不具有解释的统一性，其边界宽泛得已经让人无话可说；无处不在的国学、无人不谈的国学，五花八门的杂乱样子，又几乎让人不忍置喙，不知从何处落脚了。清代学者凌廷堪（1755—1809年）在论及天下学术变迁之大势时，有谓：“学术之在天下也，阅数百年而必变。其将变也，必有一二人开其端，而千百人哗然攻之；其既变也，又必有一二人集其成，而千百人靡然从之。夫哗然而攻之，天下见学术之异，其弊未形也；靡然而从之，天下不见学术之异，其弊始生矣。当其时亦必有一二人矫其弊，毅然而持之。及其变之既久，有国家者，绳之以法制，诱之以利禄，童稚习其说，毫耄不知非，而天下相与安之。天下安之既久，则又有人焉，思起而变之，此千古学术之大较也。”（《校礼堂文集》卷23）而当此时刻，国学作为一种时代的表征和映照学术潮流之走向的标尺，是处在“将变”“既变”之际邪？抑或已经有了一点“天下相与安之”的苗头呢？这是需要我们去认真思考的问题。当然，如何认识、如何判断之，或者采取怎样的态度、怎样的行动来对待之，这是见仁见智的事情，不必强求一律，更没有必要摆出一副唯我独尊的架势来，判断权完全掌握在每个人的手中。

作为高校的国学研究，当然有它的学术持守，不能随波逐流；有它的学科规范，不应漫越无度；有它的独特责任，不必包打天下。做自己应该做的、做自己能够做的、做自己必须做的，是从事文史哲等传统文化研究和教学工作的高校教师的职责，也是时代所赋予的任务。深圳大学人文学院集中了文史哲三个学科门类的人马，在国学研究所和国学本科实验班的基础上，又于今年新成立了国学院，隶属于学校，挂靠在学院，实行一体两牌的互动机制，凸显出国学研究的平台性、基础性和融合性，以国学来寻求人文学科之间的内在交融和体制创新，以博雅教育为宗旨，努力为人文学科的发展与繁荣创造新的增长点。根据我院现有的学科优势和师资特色，新的国学学科架构，以教学为基础，以科研为导向，以社会服务为目标，努力寻求国学建设的突破口和国学发展的新路径，强调融合文史哲不同学科之间

的力量，以凝聚起人文基础学科的创造力和吸引力，为提高深圳大学文科建设的水平作出应有的贡献。正是本着这样的想法和目标，我们在学校领导和相关机构的大力支持下，申报了“以国学为平台的人文基础学科融合与创新”项目，得到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的资助。作为该项目的具体实施计划之一，我们编选了这套“荔园国学丛书”，集中收入我院教师在国学研究方面的新著，以贡献予社会。

深圳大学地处南国，荔子飘香，别号荔园。每年的六月份，荔枝成熟，挂满枝头，又是一年丰收时，也恰临毕业季。校园里，行将走入社会的学子们，身穿蓝袍，穿行于红荔绿荫之间，构成了一副最美的图画。我们的“荔园国学丛书”正是伴随着这样的校园美景一同诞生的，愿它像学子们一样，带着成熟，带着希望，走遍天涯。

景海峰

2017年6月5日于荔园

目 录



丛书序

历史与诗人心灵的碰撞——唐诗咏三国论析 / 1

诗人与驴：唐代诗人创作生活及审美心理管窥 / 14

论唐五代文人边塞词 / 21

试论唐五代词中的“小夜曲”《更漏子》 / 36

五代荆南文学概论 / 46

试论李白乐府诗与曲子词创作之关系 / 58

从宋人的模仿与次韵看李白词的传播与影响 / 67

从追摹次韵看金元明代词人对李白词的接受 / 80

韩愈贬谪潮州的人生体验与诗文创作 / 94

禅与诗：温庭筠艺术风格成因新探 / 106

“能悦诸心，聊甘众口”——温庭筠小说初探 / 114

论“花间词人”牛希济的散文创作 / 127

唐宋词定量分析的理论探求与学术实践 / 136

宋词描写琵琶妓乐的审美解读与文化观照 / 147

试论唐宋《望江南》词的艺术风格 / 173

论宋词长调“金曲”《满江红》的形体格律特征 / 185

试论晏几道《鹧鸪天》词的创作成就 / 198

苏东坡的文学幽默与游戏文学 / 207

历代次韵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的定量分析 / 213

试论秦观的个性特征及其演变过程 / 227

宋南渡词人康与之生平事迹考述 / 234

周紫芝《竹坡词》交游唱和人物三考 / 244

历代词人次韵陆游词初探 / 254

柳永的光彩——评《柳永和他的词》 / 264

唐宋词美学研究的新突破——评《唐宋词美学》 / 272

词体学的初步建构——评《宋词体演变史》 / 275

后记 / 281

历史与诗人心灵的碰撞 ——唐诗咏三国论析

在灿烂辉煌、琳琅满目的唐代诗苑中，生长着一株后起的诗苗，虽说它早在如日中天的盛唐时期便已崭露头角，但它的茁壮成长则是在太阳渐渐西下的中晚唐时期。这株诗苗便是“咏史诗”。尽管在蔚为大观的唐诗国度里，咏史诗并不占有显赫的位置，然而它的价值和意义却是不容忽视与否定的。咏史诗早在《诗经》中就已萌芽，经过千百年的演变至唐代趋于繁盛，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当然，它的创作更与现实社会和时代息息相关。近年来学术界对唐代咏史诗的研究正在逐步深入地展开。本文选取唐诗咏三国这一断截面来加以考察，试图从中发掘出一些新的见解。

据笔者初步阅读、检索与统计，在《全唐诗》中，咏三国的诗篇约有 120 余首。这个数字占唐诗总数的比例虽然很小，但在唐代咏史诗中却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从宏观层面来看，唐诗咏三国具有这样一些突出特征。①从时间跨度看，自盛唐到晚唐五代，绵延二百多年。②从作者身份地位看，大多数是士大夫文人，也有皇帝和僧人等。③从作者与作品的对应关系看，作者共 49 人，多数人只有一两首，但有多达十数首者（如杜甫、胡曾、孙元晏等），其中有不少杰出的诗人，如李白、杜甫、岑参、刘禹锡、杜牧、李商隐、温庭筠、罗隐、陆龟蒙、皮日休、胡曾。④从作品质量看，有不少光彩照人、千古传诵的名篇佳制。⑤从作品内容题材看，举凡三国的主要英雄人物如蜀之先主刘备，丞相诸葛亮，大将关羽，张飞；魏之武帝曹操，陈王曹植，大将司马懿，文士祢衡，陈琳；吴之霸主孙权，大将周瑜，吕蒙，甘宁，徐盛，谋士鲁肃等均有描写，三国的重要事件如躬耕陇亩、三顾茅庐、联吴抗曹、赤壁大战、吴蜀联姻、祢衡被杀、甘宁斫营、白帝托孤、七擒孟获、北伐中原、诸葛去世、孙皓降晋等，均有所反映。可以说，这一百多首诗就像一百多幅画，连缀起来便是一卷唐代诗人绘出的三国历史连环画。唐代诗人为什么会对三国历史和人物如此感兴趣，历史与现实是如何在唐代诗人的心灵上发生碰撞与联系的，他们在这些咏三国诗中反映了怎样的历史观、价值观、审美观和情感心态，又具有哪些思想价值和审美意义，本文即尝试在历史与现实的交叉点上来探讨和解释这些问题。

二十世纪意大利著名哲学家贝奈戴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曾提出一个著名的观点:“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他比较“历史”和“编年史”说:“历史是活的编年史,编年史是死的历史;历史是当前的历史,编年史是过去的历史;历史主要是一种思想活动,编年史主要是一种意志活动。”^①他认为人们研究历史总是一种现时现刻的思想活动,是由现时的兴趣引起,也是按现时的兴趣来思考和理解的。这个论断指出了历史的当代性。这一近现代史学新理论对于我们研究咏史诗也是具有启示意义的。唐代诗人对三国历史的吟咏,自然带有唐代社会的时代性与唐代诗人的主体性,可以说,在这一百多首诗篇中,至今仍跳动着唐代社会的脉搏,奔涌着唐代诗人的情感浪潮,是唐代诗人用心灵谱写的一部历史交响乐,一曲英雄赞颂歌!

(一) 总基调——对三国英雄业绩的景仰与肯定

唐代是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尤其盛唐时代,国家的强大,政治的清明,文化的发达,经济的繁荣,鼓舞着文人士子们的雄心壮志,他们的精神昂扬向上,胸襟开阔敞荡,他们向往历史上的一切英雄豪杰,三国英雄事业尤其为他们所崇拜与景仰。李白和杜甫便是典型代表。请看李白的《读诸葛武侯传书怀赠长安崔少府叔封昆季》:

汉道昔云季,群雄方战争。霸图各未立,割据资豪英。
赤伏起颓运,卧龙得孔明。当其南阳时,陇亩躬自耕。
鱼水三顾合,风云四海生。武侯立岷蜀,壮志吞咸京。
何人先见许,但有崔州平。余亦草间人,颇怀拯物情。
晚途值子玉,华发同衰荣。托意在经济,结交为弟兄。
毋令管与鲍,千载独知名。^②

诗篇热烈赞颂了诸葛亮蛰伏陇亩,待时而起,“立岷蜀”“吞咸京”的雄才大略和丰功伟绩,对刘备与诸葛亮的“鱼水顾合”“风云海生”的君臣际遇表示了衷心的向往,并明确表示自己也有像诸葛亮那样的“拯物情”和“经济意”,希望得到荐拔和施展。在这里还可以看出诗人对汉末群雄纷起、三国鼎立的历史局势是基本肯定的,认为这是“汉道”衰落的必然结果。尽管他于群雄之中特别推尊蜀汉功

^① 参见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8页。

^② 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16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缩印本,第395页。

业，但对群雄各怀“霸图”也未轻予否定，而是认为“割据资豪英”，谁有本领谁得英雄谁成霸业。这种思想感情和历史价值观念在杜甫和其他诗人的作品中也得到了表现。

杜甫在《夔州歌十绝句》其二中写道：“英雄割据非天意，霸王并吞是物情。”据仇兆鳌《杜诗详注》引朱注云：“英雄割据，谓公孙述、刘焉辈，霸王并吞，如汉高以巴蜀收中国。窃据者逆天，得民者致主，见在德不在险也。”^①可见杜甫是反对割据主张统一的。但他似乎并不认为三国的鼎立是历史的倒退，在《谒先生庙》中写道：“惨淡风云会，乘时各有人。力侔分社稷，志屈偃经纶。复汉留长策，中原仗老臣……”^②可见他认为三国鼎立是“乘时”所致，刘备夺取蜀中并非为了割据称雄，而是为了完成“复汉”的统一大业。又如张鼎和吴筠在《邺城引》和《建业怀古》中写道：“君不见汉家失统三灵变，魏武争雄六龙战。荡海吞江制中国，遏天运斗应南面……”^③“炎精既失御，宇内为三分。吴主霸荆越，建都长江滨。爰资股肱力，以静淮海民……”^④除了从总体上肯定三国鼎立之外，还对魏武的中原争雄和孙吴的主霸江南给予了热烈颂扬。同时还可以看出，这种“汉家失统三灵变”“炎精既失御，宇内为三分”的评述与判断，与上述李白、杜甫的观点如出一辙，共同反映了一种“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盛极而衰”的传统史学观念。他们既把三国的鼎立看作“汉道”腐败的必然结果，又把它视为新的大一统出现之前的过渡阶段。他们淡化了三国鼎立的割据分裂性质，而把看问题的眼光向前、后两极展开，既看到了三国鼎立的历史原因，又充满希望地瞻望着一个美好的前景。他们更欣赏的是在三国鼎立之中所表现出的那种多方对抗的力量与智慧的美，那种“惨淡风云会，乘时各有人”“鱼水三顾合，风云四海生”的乘时而起、建功立业的英雄壮举。正因为如此，赤壁大战、诸葛亮南征北伐等左右时局、叱咤风云的英雄壮举，也特别受到唐代诗人的歌咏。请看：

二龙争战决雌雄，赤壁楼船扫地空。
烈火张天照云海，周瑜于此破曹公。
君去沧江望澄碧，鲸鲵唐突留余迹。
一一书来报故人，我欲因之壮心魄。

——李白《赤壁歌送别》^⑤

烈火西焚魏帝旗，周郎开国虎争时。

① 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15，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3册，第1303页。

② 仇兆鳌注：《杜诗详注》，第3册，第1353页。

③ 张鼎：《邺城引》，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202，第478页。

④ 吴筠：《建业怀古》，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853，第2090页。

⑤ 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167，第394页。

交兵不假挥长剑，已挫英雄百万师。

——胡曾《赤壁》^①

五月驱兵入不毛，月明泸水瘴烟高。

誓将雄略酬三顾，岂惮征蛮七纵劳。

——胡曾《泸水》^②

在这里，赤壁大战这场奠定三国鼎立局势的著名战争被描写得如此轰轰烈烈，精彩绝伦。诗人们丝毫没有因曹操统帅百万大军竟然未能一举荡平江南统一中国而惋惜，更没有把赤壁大战看作一场推迟统一进程的战争而加以批判，相反，诗人们对这场战争大加赞颂，把它看作两种力的较量，而且是对比悬殊的力的较量，看作英雄与英雄的决斗，横扫北中国、拥兵百万的曹操固然是英雄，而凭恃长江天险采用火攻战术大破曹军创造以少胜多奇迹的指挥者周瑜更无愧为豪杰。使诗人们惊叹钦仰的正是这种力量与智慧的较量，正是这种轰轰烈烈的英雄事业。

从总体上对三国英雄业绩的肯定、向往与歌颂，构成了唐诗咏三国的总基调。这种审美判断和价值取向既反映了一种英雄崇拜的传统文化心理，也体现了唐代社会昂扬壮大的时代风貌。首先，它取决于三国在历史长河中的特殊性。在结束春秋战国的长期纷争之后建立起来的大一统封建帝国，在经历了它的第一个发展高峰之后于汉末走向衰落。三国正处于这个高峰之后的峡谷地带，是导向另一个高峰的第一座桥梁，它是春秋战国之后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又一个典型例证，同时，它不仅是一个分裂战乱的年代，而且是一个英雄辈出、群雄逐鹿、风云际会、辉煌壮烈的时代。这大概正是三国历史与英雄格外吸引唐代诗人的历史本体因素之所在。其次，它更取决于唐代诗人所处的特定时代与特定心态。盛唐时代的诗人受繁荣强大的政治形势的鼓舞，投笔从戎、驰骋疆场的时代精神的感召，科举制度的实行又为他们打开了通向政治舞台的希望之门，极大地刺激和推动了他们对功名事业的向往与追求，使他们在情感和心态上更倾向三国风流人物并以之作为理想的化身而形诸歌咏。从中唐开始，随着大唐盛世的衰落乃至一去不复返，希望与理想亦随之黯淡乃至最终破灭，诗人们对三国历史与英雄的咏叹，更多的则是寄托着一种崇拜与追怀、感伤与抚慰相互交杂的沉郁悲壮的情怀。

（二）主旋律——对圣君贤相的歌颂与呼唤

在这一百多首咏三国的唐诗中，约有 10 余首是咏先主刘备的，约有 30 余首是咏诸葛武侯的，两项加起来约有 50 首，占总数的比例高达 40%。这个数字本身便清楚地表明了唐代诗人的一种群体意向，即对蜀汉政治集团及其领袖人物的趋

① 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 647，第 1633 页。

② 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 647，第 1633 页。

奉与崇仰。这种趋奉与崇仰鲜明地体现了唐代诗人乃至广大文人士子的一种共同的价值判断与政治理想，即对圣君贤相的歌颂与呼唤，这就是贯穿始终的唐诗咏三国的主旋律。

三国时代，英雄辈出，人才林立，何以刘备和诸葛亮独受唐代诗人青睐呢？本文认为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如传统观念的影响，民间趣尚的渗入，时代精神的激发，等等，但首先应从刘备和诸葛亮这两个历史人物本体方面去寻找答案。

下面先谈刘备。在唐代诗人看来，刘备之所以能在汉末群雄争霸的局势中与孙、曹三分天下而奠定蜀汉帝业，主要依靠三件法宝：一是“复汉”策，二是“恩信”术，三是栋梁材。

前举杜甫《谒先主庙》所云“复汉留长策”，指出了刘备以“复汉”相号召的统一大业在当时“乘时”顺天的性质。对此，刘禹锡在《蜀先主庙》诗中作了更明晰的表述：“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势分三足鼎，业复五铢钱……”诗人在题下自注：“汉末谣：‘黄牛白腹，五铢当复。’”^①“五铢钱”是汉武帝元狩五年铸行的一种钱币，王莽篡汉时罢废，东汉初年光武帝又恢复使用。诗人所引汉末民谣即寓意汉室将重新振复之意。此诗高度赞颂了刘备不以“三分”为满足，志在振兴汉室统一中国的雄图远略。刘备以汉室后裔的身份打出“复汉”的旗帜，不仅符合儒家“正统”观念，而且顺应了天时和民意。然而仅有“复汉”之“长策”是不够的，刘备的可贵之处还在于善施“恩信”之术。据史籍记载，刘备是个“仁义”之君。这种“仁义”之中既包含着一种仁政爱民的思想，也混合着一种“平民义气”的成分。这也正是刘备既受广大民众拥戴也受封建士大夫文人敬仰的一个重要因素。对刘备的这种“仁义”“恩信”之举，唐代诗人也予以肯定与赞颂。如唐彦谦《邓艾庙》诗云：“昭烈遗黎死尚羞，挥刀斫石恨谯周。如何千载留遗庙，血食巴山伴武侯。”^②对刘备爱惜民众的仁德之举给予热情颂扬，而对灭蜀的魏将邓艾死后被立庙享祀“血食巴山伴武侯”表示不满。又如徐夤咏《蜀》诗云：“虽倚关张敌万夫，岂胜恩信作良图。能均汉祚三分业，不负荆州六尺孤。绿水有鱼贤已得，青桑如盖瑞先符。君王幸是中山后，建国如何号蜀都。”^③在他看来，关、张之勇固不可少，“恩信”之用更为重要，有“恩信”方能得贤才，“作良图”。又如储光羲《荐玄德公庙》诗云：“神道本无己，成化亦自然。君居寥天上，德在玉华泉。真游践王豫，永日迟云仙。表微在营道，明祀将祈年。灵山俯新邑，松上生彩烟。岂知穆天子，远去瑶池边。”^④兴亡盛衰本是自然规律，英雄虽逝，而德行长存，五百年之后犹令诗人追怀缅想，并奉上一支虔诚的心香，祈祷圣德保佑年丰民康。由此可见刘备在唐代诗人心目中也依然是被当作一个“仁义”之君来顶礼膜拜的。

① 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357，第890页。

② 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672，第1688页。

③ 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710，第1792页。

④ 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136，第316页。

刘备最受唐代诗人推崇和歌颂的是他的求贤若渴和知人善用。这只要看看他们对刘备“三顾茅庐”众口一词的歌唱，便显而易见了。

鱼水三顾合，风云四海生。

——李白《读诸葛武侯传书怀赠长安崔少府叔封昆季》^①

玄德苍黄起卧龙，鼎分天下一言中。

——崔道融《过隆中》^②

若非先主垂三顾，谁识茅庐一卧龙。

——汪遵《南阳》^③

豫州军败信途穷，徐庶推能荐卧龙。

不是卑词三访谒，谁令玄德主巴邛。

——周昙《蜀先主》^④

鼎分天地日，先主力元微。鱼水从相得，山河遂有归。

任贤无间忌，报国尽神机。草昧争雄者，君臣似此稀。

——李中《读蜀志》^⑤

在唐代诗人看来，作为一个明君除了自己要具有雄图大略和圣贤品德之外，还必须有栋梁之材的辅佐，而人才的得来又必须依靠一种执着追求的精神和礼贤下士的品德。这既是开国立业的根本，也是治国守业的保证。李九龄对这一点予以特别强调，他的《读三国志》云：“有国由来在得贤，莫言兴废是循环。武侯星落周瑜死，平蜀降吴似等闲。”^⑥他以为蜀与吴的灭亡主要是因为诸葛亮与周瑜这两根栋梁的倾倒。刘备之所以被唐代诗人奉为一个圣明之君而予以热情讴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起用和信任诸葛亮这个贤能之臣。

下面再谈诸葛亮。可以说诸葛亮是最受唐代诗人推崇的三国“风流人物”。单是直接以诸葛亮为主角形诸歌咏的诗篇就有 30 余首，其他间接提到的地方也很多。如果说李白是第一个为诸葛亮唱出热情赞歌的唐代诗人，那么杜甫则为这批唐代诗人谱写的诸葛亮赞歌唱出了最强音。仅是以“蜀相”“诸葛庙”“武侯庙”“八阵图”等为题直接吟咏诸葛亮的诗篇就有 10 首左右，其他间接涉及的篇章也有数十首。凡是诸葛亮在蜀中留下遗迹的地方，如成都武侯祠、夔州诸葛庙、庙中的古

① 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 168，第 395 页。

② 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 714，第 1800 页。

③ 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 602，第 1527 页。

④ 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 729，第 1830 页。

⑤ 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 748，第 1866 页。

⑥ 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 730，第 1831 页。

柏、江滩上的八阵图等，都令诗人睹物怀人，心驰神往，写下了一篇又一篇咏史抒怀的杰作。杜甫于《诸葛庙》中自称“久游巴子国，屡入武侯祠”^①，当他在锦官城外瞻拜武侯祠后，写下了《蜀相》这一千古传诵的名篇：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频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②

饱满深沉的情感，沉郁悲壮的风格，使得诗篇与英雄本人一起流芳百世，千载之下犹能感动人心。在夔州进诸葛庙奉香时，他又写下了《诸葛庙》一诗，“君臣当共济，贤圣亦同时。翊戴归先主，并吞更出师……”对诸葛亮的政治际遇与道德品质给予了由衷的赞颂。在观赏了夔州西南永安宫前江滩上的八阵图遗址后，他又写下了《八阵图》一诗，对诸葛亮“成八阵图”之“名”、“盖三分国”之“功”^③，给予了高度的概括与肯定。尤其是《咏怀古迹五首》之五，可谓是对诸葛亮一生的总结性评述与咏赞，诗云：

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
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
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
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④

在这里，杜甫高度评价了诸葛亮凌驾萧（何）、曹（参），上方伊（尹）、吕（尚）的雄才大略，鼎足三分、雄视天下、独步云霄的丰功伟绩，热情讴歌了诸葛亮不仅为报先主知遇之恩，为之运筹驱驰从而缔定蜀汉帝业，而且当后主昏庸之朝犹能为完成“复汉”大业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至忠品节。可见诸葛亮最受杜甫推崇和景仰的有三点：一是雄才，二是至忠，三是丰功。有雄才，兼至忠，方能建丰功，成大业。可以说诸葛亮正是封建社会广大知识分子心目中理想的贤相模范。然而悲剧正在于如此才德兼备的英雄豪杰最终未能完成统一大业，遂成千古憾事。对此，杜甫只能将悲剧的发生归因于天意，并为之发出深沉的悲叹。

像杜甫这样如此倾慕诸葛亮者，从晋至唐的六百多年间，恐怕难找第二人。这可能与杜甫的政治理想、生活经历和情感心态有着密切的关系。首先与杜甫的理想

① 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19，第4册，第1674页。

② 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9，第2册，第736页。

③ 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15，第3册，第1278页。

④ 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17，第4册，第1506页。

抱负有关。出身于“奉儒守官”家庭^①，“窃比稷与契”^②，怀抱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崇高政治理想的杜甫^③，与许身管、乐；心怀天下的诸葛亮正好相似，因此诸葛亮也就成了他崇拜的对象、理想的化身。其次与杜甫的蜀中生活有关。杜甫在巴蜀一带生活了近十年，这正是“安史之乱”期间。《登高》诗云：“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④这就是大乱之际杜甫在蜀中的生活写照。然而他时刻忧念的是“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⑤，想到“中兴业”，他自然怀想起三国时雄据蜀中、南征北伐、誓欲完成“复汉”大业的诸葛亮。“赋诗独流涕，乱世想贤才。”^⑥《昔游》诗中这两句正好道出了杜甫追怀仰慕诸葛亮的时代因素与特殊心态。希望有像诸葛亮这样的经国贤才来收复叛乱重振中兴大业，这正是一种时代的呼声。再者与杜甫的政治遭遇有关。杜甫在政治上一直不得意，入蜀之后竟致于仰人施舍，更遑论报国安民，不免有“自古圣贤多薄命，奸雄恶少皆封侯”的不遇之叹^⑦，故将满腔郁愤不平暗寓于吊古咏史之中，借诸葛亮得逢“三顾”恩遇建立不朽功业的历史以补偿现实生活中的失意。

“安史之乱”后，唐王朝踏上了“下坡”的路程。一部分知识分子怀抱“中兴”之想起而变革，可“中兴”终成一梦，进入晚唐时期，社会政治更趋腐败衰落。在希望与失望之间，诸葛亮自然成了人们渴慕呼唤的对象，寄托理想哀愁的精神载体。所以，在杜甫之后的中晚唐诗坛上，进一步掀起了吟咏三国历史尤其是追怀讴歌诸葛亮的创作热潮。这是受时代因素决定的，按克罗齐的观点即现时兴趣的激发。请看：

执简焚香入庙门，武侯神像俨如存。
因机定蜀延衰汉，以计连吴振弱孙。
欲尽智能倾僭盗，善持忠节转庸昏。
宣王请战贻巾帼，始见才吞亦气吞。

——武少仪《诸葛丞相庙》^⑧

猿鸟犹疑畏简书，风云常为护储胥。
徒令上将挥神笔，终见降王走传车。
管乐有才真不忝，关张无命欲何如。

① 杜甫：《进雕赋表》，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24，第5册，第2172页。

② 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4，第1册，第264页。

③ 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1，第1册，第74页。

④ 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20，第4册，第1766页。

⑤ 杜甫：《凤凰台》，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8，第2册，第692页。

⑥ 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16，第3册，第1436页。

⑦ 杜甫：《锦树行》，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20，第4册，第1808页。

⑧ 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330，第814页。

他年锦里经祠庙，梁父吟成恨有余。

——李商隐《筹笔驿》^①

此外，还有薛逢的《题筹笔驿》、李山甫的《代孔明哭先主》等篇，兹不一一列举。从这些诗篇中可以看出，对诸葛亮的管乐之才、鼎分之功、忠君之节的倾慕与歌颂，对诸葛亮未能完成统一大业的遗恨与悲叹，均不出杜诗的吟咏范围，只不过更增添了一丝感伤哀怨的时代色彩。

如果我们拿至今仍矗立在成都武侯祠门前被后人誉为文、书、刻“三绝”的“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来印证^②，便完全可以得出结论：对诸葛亮的推崇与歌颂乃是唐代知识分子的一种群体意识，甚至也一定程度地反映了广大人民的崇尚与愿望。碑文是由中兴名臣裴度于元和四年游成都武侯祠时写下的，由著名书法家柳公绰书写，著名镌刻家鲁建勒石，故称“三绝碑”。碑文对“陈寿之评”与“崔浩之说”明确表示不满：“而陈寿之评，未极其能事；崔浩之说，又诘其成功。此皆以变诈之略论节制之师，以进取之方语化成之道，不其谬欤！”^③以简洁而概括的笔触记叙了诸葛亮一生的主要经历和动人事迹，对其历史功绩和杰出才能给予高度评价，甚至把他奉为一个集“立身之道”“治人之术”“事君之节”“开国之才”于一身的“完人”。碑末“蜀国之风，蜀人之心，锦江清波，玉垒峻岭，入海际天，如公德音”数语，则反映了蜀中人民对诸葛亮的深挚热爱与真切怀念之情。这与杜甫在《咏怀古迹五首》之四中所反映的“古庙杉松巢水鹤，岁时伏猎走村翁。武侯祠屋常邻近，一体君臣祭祀同”^④，李频在《送友人入蜀》诗中所描述的“鼓吹青林下，时闻祭武侯”的蜀中风俗完全符合^⑤。可见“屡入武侯祠”“执简焚香入庙门”的不仅是杜甫、裴度、武少仪等士大夫文人，而且还有广大的蜀中百姓。

综上所述，可见唐代诗人对三国的吟咏的确表现出一种倾向性，即对蜀汉政治集团的推薄与歌颂。值得注意的是，被后人誉为勇将的张飞、赵云，尤其是被捧为“神”的关羽，在唐代诗人的眼中并无光彩，他们追怀、倾仰与歌颂的主要是先主刘备和丞相诸葛亮，而且是众人一心，众口一词，他们俨然成了唐代诗人心目中的理想的圣君与贤相形象，除了赞美他们各自身上所具有的君、相才能与贤圣品德之外，最令唐代诗人钦羨与赞颂的便是二人的“鱼水顾合”“贤圣同时”“君臣共济”的合作与默契。应该说，这是唐代诗人将时代的需要、人民的心声，以及自己心中的愿望熔于一炉而铸造的一种理想模式。

① 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539，第1363页。

② 裴度：《蜀丞相诸葛亮祠堂碑》，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877，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6册，第4626页。

③ 陈寿《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评曰：“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4册，第934页。

④ 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17，第4册，第1505页。

⑤ 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588，第1502页。